

略论哲学社会科学的 繁荣发展在建设先进文化中的重要性

郑黔玉

摘要: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表明:社会变革(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变革)总是以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变革为前提和先导的,而观念、价值的变革又总是发生并且完成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哲学社会科学所具有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建设先进文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展繁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繁荣 先进文化

中图分类号:BO、C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4)07-008-02

近几年,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发表讲话,深刻论述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巨大作用,强调大力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和在建设先进文化中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性质、价值、功能以及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政治意义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勉励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努力承担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如此大的力度来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并对哲学社会科学作出如此全面、系统的界定,在建国以来是首次,这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对于在新世界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无疑是强有力的推动,而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理论的武装,也是实践的指导。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永无止境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人类最初要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自然界,目的在于一方面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另一方面规避自然界对人的危害。于是产生和发展起了以揭示自然因果规律为特征的自然科学。但是,认识、改造自然的活动不

是单个人能够孤立进行的,而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分工、协作中进行,于是人们便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及生产劳动的结果有不同的影响,这就需要对社会及其各种关系进行了解与探究,旨在掌握人类社会(包括人们的思想、行为、感情、趣味、心理倾向等方面)的本质与规律,以便为认识和改造自然提供各种社会的、智力的和精神文化的氛围与条件,同时为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提供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心理的、道德的、审美的、管理的等等依据,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

不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外国历史上,千百年来都曾涌现过数不胜数的思想家和智者,他们要么在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规律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要么在认识人类社会、创造精神文明成果方面创造过灿烂的成就,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光彩夺目的篇章。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与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的阶段性发展直接相关的,而这种阶段性发展,又是与一个又一个光辉的科学家、思想家的名字分不开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与伟大的科学家相比,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等等)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作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更加不可替代。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几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是在强有力的思想文化的引导下发生的,即便有的没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老子的奇想,孔子的布道,商鞅的执着,屈原的忧愤,司马迁的正直,诸葛亮的胸怀,李白的豪放,韩愈的沉思,王安石的坚韧,范仲淹的境界,王阳明的感悟,文天祥的慨叹,顾炎武的博大,龚自珍的疾呼等等,所有这些,早已成为时代的标志而留在了世世代代中国人的记忆中。至于说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那更是与大思想家、大政治家们的思想和活动直接关联着。如果没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不会有康有为的忧国忧民;如果没有严复等人对西学

的引介,就不会有戊戌维新;如果没有康有为改良思想的经验教训,就不会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东渐,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洞察,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走出一条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如果没有1978年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和科技、教育等一系列价值判断,就不会有中国的经济、科教腾飞;如果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不会有今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局面,等等。反过来讲,历史上凡是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指导思想、路线偏了或错了,经济社会及其他事业的发展也就必定滞后、受挫。

从世界历史来看也是如此。与古代中国相比,西方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传统,因此西方的哲学社会对自然科学的进退、沉浮有着更大的制约作用。古希腊是西方古代自然科学的黄金时期,当时的特点是科学与哲学不分家,甚至常常就是一回事,因此,科学的成就往往就是哲学的杰作,反之亦然。然而到了中世纪,神学(一种与黑暗政治合为一体的虚幻的哲学体系)一统思想界,便造成了自然科学在欧洲长达千年的停滞不前;而文艺复兴号角的劲吹,则宣告了神学蒙昧统治的瓦解和科学纪元的来临,于是欧洲进入了一个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哲学理性主义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巨人们,从但丁到薄伽丘,从达·芬奇到米开朗基罗,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培根到洛克,从笛卡尔到莱布尼茨,从伏尔泰到狄德罗,从伽利略到牛顿,从康德到黑格尔等等,他们有的对自然科学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但更多的是对哲学社会科学贡献了不朽的经典。还应指出的是,近现代西方许多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像他们的古希腊先辈一样,同时也是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达·芬奇、笛卡尔、莱布尼茨、布鲁诺、牛顿、康

造业发展紧密联系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会将一部分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生产转移进来。总体看,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了。

记者:鉴于上述问题的出现,您有何想法?

张立群: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充分发挥市场对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投资活动的调节作用,优化重大经济比例关系,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同时要特别注意转变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模式,努力适应主要由市场调节经济运行的新形势。特别要注

意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稳定总量政策,强化结构性政策。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干扰,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责编:查谨)

德、爱因斯坦、玻尔、霍金等等。

历史一再表明并将继续表明:社会变革(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变革)总是以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变革为前提和先导的,而观念、价值的变革又总是发生并且完成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凡是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往往是哲学社会科学成就辉煌、思想文化大师灿若群星之际。正是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出来的思想、信仰、价值、理想、情感、美、崇高等等,点燃了智慧和爱的火焰,维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于不坠,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基本动力和基本内核,将世界历史熔铸成为一部辉煌的史诗。

二

改革开放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人民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应当是公认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个领域所涵盖的,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换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先进文化”,与健康、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致的,两者都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4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这段话,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功能及价值的高度概括,是对“先进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科学解释,也是对如何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的重要提示。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的贡献,首先体现在思想建设方面。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千百年来,凡是站在科学高峰的民族,往往也是站在理论思维高峰的民族;人类历史上,那些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思想巨人,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到了“领风气之先”的作用,即用他们的先进思想的说理力和感召力,影响了一大批人,从而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显得特别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在这方面的巨大作用怎么估计也是不会过高的。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营造出一种主流性的道德氛围,使社会成员们的价值取向受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使他们的精神保持一种合理的、向上的状态。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是由那些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提出,再由政府予以倡导和推行的,比如中国汉代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某些时候的“崇佛抑道”,以及宋代的“三教合流”等等;在西方,则有罗马帝国对基督教从压抑到倡导的转变,文艺复兴以后新教伦理的勃兴,近现代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弘扬等等。所有这些主流价值,都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以高尚

的精神塑造人,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战略性任务。20多年来,我们党出台的许多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和策略,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文献,无不凝聚着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心血,这些文献既是党的指导方针,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杰出成果。它们对于培育国民的综合素质,营造一种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在培养人的品位、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方面有重要的作用。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拥有精神文化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分为主观和客观(对象)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了受众的聆听、阅读、观赏、吟唱、思索等等,客观方面指精神文化活动的载体(即精神产品),包括影视、歌曲、故事、书籍、舞蹈以及其他各种审美艺术形式。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中外优秀作品感染、教育、培养、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优秀作品的价值不但不会衰减,反而会与日俱增。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各种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当前这个生活价值日趋多元化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用质量上乘、形式多样、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来鼓舞人,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要求,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三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不可忽视的问题。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要强调“四个同等重要”?为什么他要从五个方面要求“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一个基本事实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并未取得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也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如今,“科教兴国”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战略口号,但是对这个口号的理解却不能不说存在着偏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片面的功利性动机在发展科教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结果便是出现了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重理工教育,轻人文教育等情况。理由很简单: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不能导致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特别是不能满足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于是出现了连北大、复旦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历史、哲学专业招生都发生困难的怪现象,而这种事情在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大学,或者在新加坡的高等院校都是不可想象的。而另一方面,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却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一些基本的历史文化现象不甚了了,显得苍白贫乏。因此,对“科教兴国”必须加以更加全面的理解。

“科教”这个概念应当从两个层面上加以解读。第一个层面是“认知”意义上的,指的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其教育;第二个层面是“价值”意义上的,指哲学社会(人文)科学及其教育。前者就其功能而言,是工具性的,其对象是自然界,其目的在于描述自然界的实际状况并揭示其的因果规律,使人最终驾驭自然界,壮大自身的物质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就其功能而言,是价值性的,其对象是人本身(尤其

是人的精神世界),它通过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法律的、管理的等等方式,来引导价值走势,造就精神理念,提升思想境界。显然,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教育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及其教育那样导致直观、迅速的结果,它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潜在的,但却是恒久的、深远的和带根本性的。20多年来,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带给中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是举世公认的,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人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战略命题的认同。而这个命题,并非一般的科学论断,而是邓小平同志这位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所作出的一项价值判断。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哲学社会科学所能够释放出来的无可估量的认知力量。

当今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科技发挥出了空前的和无与伦比的巨大创造力,为此,许多有聪明才智的人被吸引去学习工程技术,亦即学习“正确地做事”(doing things right),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出现了对人类自身的处境缺乏正确的、了解的片面性,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在思维、情趣、爱好等方面的世俗化、肤浅化和单一化。对此,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提出,必须超越实用,大力发展所谓“博雅教育”,即以哲学、人文、应用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文化素质教育。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学会“做正确的事”(doing the right things)。上世纪90年代,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作了两项研究,第一项发现,学习人文科学的毕业生在经过25年以后,比学习商业和工程的人在管理头衔上提升得更快;第二项是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发现刚刚毕业的人希望学到更多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具有10年左右工作经历的人们却后悔没有学到更多的商业和管理方面的知识,而工作了20多年的人则后悔没有更多地学习文学、哲学和历史。

综上,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深厚的人文教养,应当是现代化事业所需人才的基本素质。现代教育,从其根本目标来说,绝不仅仅是要培养具有某种专长的“专才”,而是要造就全面发展的“通才”,即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经济和科技成就,这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立足。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可以是世界上头等的经济强国,但是如果它没有文化,不能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库作出积极贡献,就会像过眼烟云,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影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分析和计算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时,对于文化教育和国民素质都给予了很大的份量。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强国,而且必须成为文化强国,即为世界精神文明的宝库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严谨治学、潜心钻研、关注现实、多思慎思、厚积薄发,用实际行动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伟大使命。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
贵州贵阳 550025) (责编:若佳)